

推进城镇化要顺应市场规律

日前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。这次会议将对未来一段时间的新型城镇化建设，产生关键性的影响，有助于廓清并扭转一些政府部门、民众在城镇化上的观念误区。从会议内容可以看出，推进新型城镇化，不是一些政府部门想怎样、就怎样的事情，也不是由一些政府部门和专家凭空规划，而是必须以顺应市场规律为前提。

会议明确提出，“要遵循规律，因势利导，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、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”；“推进城镇化，既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

又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、编制发展规划、建设基础设施、提供公共服务、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”。

这些论述对当下，很有针对性。现在，考察过往，不难发现很多失败的城镇化的案例。有的城市规划了很多卫星城，意图分解承担城市功能、疏散中心城区人口，结果，这些卫星城并没有发挥作用，有的成了“睡城”，有的成了“鬼城”。而在过去的很多年，一个主流的城镇化的思路就是发展中小城市，抑制特大城市的发展。结果，一二十年下来，中小城市确实实现了大发展，但是，特大

型城市也不断涌现，而且规模不断扩张，当初竭力避免的大城市病，一件不落全都成了现实。

现在，中国城镇化所出现的一些问题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计划者的自负。一些政府部门认为，通过所谓的规划和管制等手段，可以扭转市场发展的趋势，可以改变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的方向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也缺乏想象空间。因而，很多地方在城镇化过程中处于被动，出现市场与规划的脱节，城镇化与公共服务的脱节等各种乱象。

另一方面，也应该看到城镇化本来是一个城市和农村双向

自然流动的过程，也就是说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“逆城镇化”。很多城市人口会厌倦大城市的生活，而回流乡村养老、经营。对有着浓厚乡土情结的中国社会来说，“逆城镇化”正是满足很多国人的乡愁。所以，城镇化也应避免单向化倾向。现在，很多地方已经在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大开方便之门，而城市人口回流农村，却在宅基地产权流转、养老、社保等方面遭遇不少制度障碍。如果，人口单向朝城市流动，只会让一些城市病日益严重。

推进城镇化需要政府更好地

发挥作用，而不是一味由政府来决定、主导城镇化具体的进程和方向。不能说，一些政府部门、官员已经习惯了行政权力带来的幻觉，要摆脱这种自负，变得谦抑，也是现实的难题。然而，要避免重复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，确实需要让政府的权力真正尊重规律、尊重市场、顺势而为。这需要相应的制度改进，也需要城市的决策者耐心倾听民意，尊重法律，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，充分讨论、审慎制定城市的重大政策，如此才能尽可能贴近市场，让规划的前瞻性符合市场需求，从而尽可能避免决策失误。

京文

八项规定制度化要从“细节”做起

时近岁末，中央为整饬政风而出台的八项规定执行已一年有余。八项规定的效果明显，公款送礼、餐桌浪费、形式主义、官样文章、迎来送往、奢靡享乐等不良风气得到有效遏制。公众仅凭自身感受，也能发现清新社会风气的势头渐强，曾经猖獗的公款吃喝风已大大减弱。八项规定的有效落实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监督，也离不开纪检部门、职能部门、执纪执法力度。

公款吃喝、奢靡享乐等多年来不断顽强生长的社会积弊，目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，但恶习如顽疾，在持续高压下式微的不良政风，现在还远未土崩瓦解。一些领导干部明着不敢吃喝了，暗里却敢收取储值卡、提货单；一些官员的身影消失在高档酒店、餐厅，却出现在私人会所或所谓的农家院。还有有的职能部门更是坐拥豪华楼堂馆所，吃喝腐败在内部解决。

八项规定还有很大进一步落实的空间，而对于目前取得的成果也要不断巩固，以防止奢靡腐败之风卷土重来。八项规定的成果必须依靠制度化的长效机制来维护、保持。近日，中央印发了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，显示出力促于部清正、政府清廉、政治清明的决心。这个规定是八项规定在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方面制度化、具体化的落实，也是中央建立八项规定长效机制的初步成果。

更重要的是，有关接待管理规定中关于干部出差吃、住、行涉及细节着手的治理思路，让我们看到未来八项规定的落实将越来越具有刚性约束，有利于遏制奢靡腐败的反弹。《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》对接待活动食、宿、行、迎送及警卫、预算等环节提出了明确要求，“工作餐应当提供家常菜，不得提供鱼翅、燕窝等”，“陪餐不得超过3人”，“住宿不得额外配发洗漱用品”，等等，对细节内容作出明确规范，强化了对公务接待的刚性约束，最大压缩了奢靡浪费的空间，让八项规定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和防腐力。

八项规定的制度化，要通过对党机关各类活动的关键环节和细节作出明确规范来实现。八项规定的制度化也要通过算细账来实现。奢靡浪费、迎来送往等行为可以大搞特搞的根本原因，就是公款机关手中有大把的钱可花，甚至有肥得冒油的“小金库”。今年八项规定成果突出，中央及地方各类机关事业单位的“三公经费”支出必定会有明显下降。在这个基础上，适度削减各机关事业单位明年的预算，就是必须要算的细账。

从严、从细是八项规定的特点，而八项规定制度化也必须依靠严格执行和细化监管。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、细化的规定，让公众看见了尺度，也让官员看见了“红线”。政府公信力和公众的反腐信心，将在点滴细节的滋润下不断生长、壮大。

樊大或

“嫦娥探月有什么用？”

嫦娥落月，玉兔巡航。神话在这一刻变成现实，“中国制造”在月球上留下自己深深的足印。

“登月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在几乎所有电视、网络直播的现场互动中，问得最多的，还是这个老问题。

无论是出于个人的好奇，还是体现对公共财政支出的监督，人们都有资格有此一问。毕竟，对于社保、医保标准都还不高的普通中国人来讲，探月工程的投入绝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
“你要做的这些有什么用？”即使是在财力雄厚的欧美，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中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同样无数次地被这样问起。他事后的总结，很是耐人寻味：“我有一个‘理论’，绝对正确，可以告诉大家。在加速器实验的发展史上，过去50年里，尽管我们为获得经费，要写一个申请报告，设定一个目标，说服政府的人投钱做加速器实验，可是往往实际的发现跟原来的目标根本没有关系。”

丁肇中说的是实话。

开发利用月球矿产、能源资源，开发超高空、弱重力、无磁场的特殊环境，建设更遥远空间探测的前哨站与中转站……这些都是探月工程的目标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——它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人肉搜索：正义光环下的私刑



12月3日，高中女生琪琪从陆丰望洋河桥上跃下身亡。前一天，因怀疑她偷窃服装，店主将监控视频截图发至微博求人肉搜索。很快，她的个人隐私信息曝光，成为身边同学朋友指指点点的对象。广东陆丰警方8日立案侦查后，将服装店主刑拘。(12月15日《京华时报》)

也许这是90后店主和参与者事先都并没有想到的结果。“人肉搜索”竟能闹出人命。

如果琪琪并非偷窃者，店主将可能面临诽谤罪。即使琪琪真是偷窃者，店主也将涉嫌侮辱罪。可见，对于店主而言，琪琪不是偷窃者只是影响罪名的因素。如此悲剧看似只是偶然的极端案例，但在偶然中有着必然。近年来，借着正义之名，“人肉搜索”成了很多网友的一种习惯。作为一种人参与和搜索引擎相结合的新型调查方式，这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，还是公众行使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的表现形式，也有不乏诸如“最美乡村女教师”这样的道德楷模因为“人肉搜索”而出名，

受到公众的尊崇。

可以说，“人肉搜索”只是一种技术手段，但在实际中常结出违法之果。这是因为“人肉搜索”和任何事物一样有着法律边界。这个边界就在于其所附带的目的和行为不能违反国家的强制性法规，也不能与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相冲突，否则将可能构成侵权甚至犯罪。

而在实践中，“人肉搜索”常常异化成了主观定罪的“判决书”，更是行使法外之罚的“通缉令”。一方面，“人肉搜索”所指内容往往真假难辨。另一方面，即使网友提供信息是真实的，也常常给搜索对象带去生活、工作的种种不便，也将侵害他人利益。

也许有人会质疑，人肉搜索应该认作是一种监督，何错之有？其

实，如果网友只是纯粹为了监督，则应该将内容和结果仅提供给相关执法机关或违法者所在单位，这就如同看作为公民在正确使用正当方式行使监督、举报的权利。而将搜索内容、过程和结果进行扩散的附带行为，实际上，已经超过了监督的范围，这是在动用“私刑”，使他人肉者及其家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将饱受社会舆论的苛责。

通过这一事件，我们应当意识到，网络只是现实社会的衍生，现实所存在的所有法律责任都能映射到网络上。在网络资讯异常发达，虚假、违法信息漫天飞的当下，每个网民都应该树立防范违法意识。发帖、转贴只在一瞬间，而事后责任的追究则可能影响终身。舒锐

互联网据说就是阿波罗计划的副产品，因为科学家需要把休斯敦宇航中心的电脑连接起来，共享信息。核磁共振、激光通讯、液晶电视和我们如今须臾不能离身的手机，也都是从载人登月的需求拉动中找到了突破的动力。而这一切，自然都没有写进阿波罗计划的立项报告，作为可行性分析的重要依据。

我们常常会这样一道管理学考题：在重要而紧急、重要但不紧急、紧急但不重要、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四类事情中，应该优先处理哪一类？人们通常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重要而紧急的事，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恰恰是那些重要但不紧急的事，需要最为认真地对待。因为它的名字叫战略布局。

曼哈顿计划、阿波罗计划、人类基因组计划、863工程、载人航天工程、嫦娥探月工程……都属于事关长远的战略规划。它们的意义，尽管最终会关乎未来的日常生活，却很难用柴米油盐酱醋茶来形容。也因为它们常常需要耗时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见到成效，任何短视的考量，都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。

记得上世纪末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之初，中国要承担人类基因组1%的任务，我们有过不小的犹豫。即使这一任务完成之后，也在科学界内部引发了不少争议。在当时条件下，大多数人觉得基因组测序属于投入巨大却难有产出的公益基础研究，中国人干这活儿是当冤大头。正因如此，担此大任的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在业内备受排挤，直到今天还有些抬不起头来。

事实是，随着基因研究向前推进，全测序成为基因工程必不可少的大数据基础，谁能形成规模处理和解析能力，谁就可能占领这一领域的制高点。而在实际应用层面，对唐氏综合征、宫颈癌、儿童耳聋等常见遗传疾病的防治，基因组测序更是堪称简便价廉、标本兼治。如果当年我们屈从于“有什么用”的逼问，放弃打持久战的勇气，今天在这一战略新兴领域，中国人又会落后至少10年。

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是创新战略的基本原则，但它绝不是面对机遇无所作为的借口。看准大方向，及时布局，伏击奇兵，敢于投入，敢于拼搏，敢于坚持，敢于胜利，这才是战略家的气魄和智慧。

陆侠

政策“半夜鸡叫”难解拥堵之根

“天津也限牌、限行！”15日19时，天津市政府召开发布会，天津紧随上海、北京、广州，加入小客车限牌、限行城市行列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天津“双限令”公布5小时后就正式实行，突如其来的政策，让此前在北京、广州上演的“汽车连夜抢购潮”在天津重现。(12月16日《新闻晨报》)

天津限牌政策从公布到实行，不过5个小时，一些市民不得不匆匆购车，搞得众人狼狈不堪。据报道，15日下午，限牌政策正式公布前，天津市多家4S商店已是人满为患，不少人直接携带现金抢购汽车。

网友感慨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有很多网民提出质疑，汽车限购这样的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，为

什么不能先征集民意？为什么要搞“半夜鸡叫”？据新华社报道，在行政许可法已经实施的背景下，对于汽车这种大件商品的限购要经历哪些民主程序尚无“说法”。

城市交通拥堵，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典型的“城市病”。在没有找到“病根”之前，似乎只有通过“限购、限牌、限行”这些行政手段，才能抑制住汽车保有量增长过快的发展态势，并逐渐被更多城市所效仿。而纵观日本、美国等国际大都市治理城市拥堵的经验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汽车发达国家大规模使用限行、限购这些行政手段的几乎没有，他们的治堵之道更多依靠的是市场化的调控手段、管理水平的提高、高科技的力量和制度设计的缜密。

当然，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现实国情，“限购、限牌、限行”可能是短时

间解决目前城市交通拥堵最快的办法，但绝不是最好的办法。所以，“半夜鸡叫”的政策将缓冲期大大缩短，也许是为了让政策得到更高效的执行，但被抑制住的消费需求却没有得到合理释放，会不会转换为其他形式从而滋生出新问题，也是需要决策者一并慎重考虑的。

另外，汽车作为一种现代交通工具，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，满足了人们提高出行效率、提升生活品质的改善性需求。这种需求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合理的、公平的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，凡是像汽车限购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，应尽可能地维护多数人的利益，用更加民主的方式倾听民意、集思广益，才能寻找到“最大公约数”，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。

宋华

“规划抵不过领导一句话”应尽早走入制度笼子

“规划规划，纸上画画，墙上挂挂，抵不过领导一句话”，这句顺口溜，形象地道出了多年来城市规划的乱象。云南省通过立法增强规划的严肃性，恐怕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。著名作家冯骥才早就毫不隐讳地说，中国某些城市的建设是由官员的意志决定的，进入最高层决策时，往往几个官员可以决定一个城市的形态。

城市规划之所以会唯长官意志，一是由于官本位思想的遗毒作怪，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氛围浓厚的国家，官本位的特殊性在于，它能瞬间转化为政府的意志。

二是官商勾结的因素。官员以城市规划谋取私利，被开发商暗地操纵，这已在一系列规划局腐败案件中，得到了证明。而且城市规划中的腐败，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规划局长：谁掌握着决策权，谁便有官商勾结的可能。

三是地方官员“唯GDP”的政绩观。一些官员急功近利，热衷于打造、展现“亮点”与政绩。所以，城市规划随心所欲地被改来改去，建筑设施建了又拆拆了又建。

规划不能唯长官意志，就必须从制度建设的高度维护好规划的刚性约束力。城市规划的制定，需要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，尊重市民的意见，听取各领域专家的建议，对城市规划及调整实行公示、听证等制度，让作为城市主人的广大群众对规划拥有充分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规划一旦确定，谁如果随意变更，就让他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，特别是对那些唯长官意志越位决策的官员，必须予以严惩。

袁浩

最近，福建泉州安溪县一所中学发布的校规，在网上引起热议。校规规定“七不准”：不许给男生传递纸条；不许和男生在偏僻的角落独处；不许认男生为“哥”；不许和男生互赠礼物；不许和男生手牵手或其他勾肩搭背的举止；不许男生在家时，不许进女生到家里做客；不许邀男生一起过生日；不许和男生单独同乘一辆自行车及其他交通工具。校规还对触犯者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。

雷人校规为何能接连不断地出台？原因无外乎几个：学校缺乏民主管理机制，校规就由行政部门单方面制定，不听取学生的意见，也不尊重学生的权益。但为何“雷人”、“奇葩”校规引起社会舆论关注，而学校办学者却不以为意，甚至从中吸取“经验”，加以发扬光大呢？

根源在于当前的功利化办学。一方面，在学校办学看来，出台严格管束学生的措施，就是遭到舆论质疑，对学校来说也

是“利大于弊”，学校更加方便管理学生不说，也可向家长交代——如此管理是为了让学生“一心学习”，相比允许学生在校园里自由活动，学校要操的心少得多。

另一方面，我国中小学关注的是学生知识教育，凡是有利于知识教育的做法，都在学校畅通无阻，哪怕这些做法被学生称为“很变态”。在知识教育第一的办学目标指引下，诸多对学生人格、身心发展有用的教育，比如生活教育、体育教育、心理教育，都因可能挤占学生的知识教育时间而被边缘化，而像男女生交往可能出现早恋现象、分散学习精力等问题，学校自然高度防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年来学校的功利化办学趋向更为明显，以前，一些办学者为出台严格约束学生行为的管理措施还觉得有些不妥，毕竟违背学生的天性，也不符合教书育人的基本教育价值理念，可是，当目睹

有的学校采取这些措施，“管理效果”很好、学生成绩提高之后，其他一些学校也就不在乎“教育”了，而只想着一心打造“考试机器”。一些学校办学甚至认为，在当前的办学环境中，管理越变态，应试越成功。学生可能不理解，但这是为他们好——考出高的分数，才是硬道理。

这就难怪河北河间的一所中学虽然饱受舆论质疑是“高考加工厂”，可是，其一年输送100多名学生进北大、清华的傲人成绩，还是吸引全国各地的教育官员、学校领导去“朝拜”，学习、取经的结果，就是一定要狠下心来对学生严格一些，把最后一分也榨出来。

与社会舆论的质疑和学生的反对相反，很多家长也是高度配合学校的，家长们认为，学校就应该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，只要能考出好的分数，就“力挺”学校，这给学校严加管理以底气。学生的权益，由此被严重漠视。

“奇葩”校规是办学功利化的集中体现

民主管理机制的缺乏，加上评价体系的功利，学校的管理必然发展到简单、粗暴，一切为功利的办学目标服务。事实上，就是学校有民主管理机制——制定校规，要广泛听取教师、学生、家长的意见，不能由行政单方面拍板，也应该有在功利的教育评价体系下，制定出雷人的校规来，更多的人赞成或者接受了为分数放弃其他教育的“办学理念”。这是整个教育的严重变异。

推进学校管理改革和推进教育评价体系改革，恰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重要改革内容，这两方面的改革只有同步推进，才能让中小学办学走出功利化，真正关注学生的终身成长，让教育回归本质。今天我国学校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，教育的评价也采取单一的分数量标准，这会加速教育功利化、雷人、奇葩的校规不会因舆论的质疑而消除，反而会上一个层次，直至登峰造极。

蒋理

“半夜鸡叫”的政策将缓冲期大大缩短，也许是为了让政策得到更高效的执行，但被抑制住的消费需求却没有得到合理释放，会不会转换为其他形式从而滋生出新问题，也是需要决策者一并慎重考虑的。

另外，汽车作为一种现代交通工具，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，满足了人们提高出行效率、提升生活品质的改善性需求。这种需求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合理的、公平的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，凡是像汽车限购这样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，应尽可能地维护多数人的利益，用更加民主的方式倾听民意、集思广益，才能寻找到“最大公约数”，从而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。

宋华

“规划规划，纸上画画，墙上挂挂，抵不过领导一句话”，这句顺口溜，形象地道出了多年来城市规划的乱象。云南省通过立法增强规划的严肃性，恐怕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。著名作家冯骥才早就毫不隐讳地说，中国某些城市的建设是由官员的意志决定的，进入最高层决策时，往往几个官员可以决定一个城市的形态。

城市规划之所以会唯长官意志，一是由于官本位思想的遗毒作怪，中国是一个官本位氛围浓厚的国家，官本位的特殊性在于，它能瞬间转化为政府的意志。

二是官商勾结的因素。官员以城市规划谋取私利，被开发商暗地操纵，这已在一系列规划局腐败案件中，得到了证明。而且城市规划中的腐败，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规划局长：谁掌握着决策权，谁便有官商勾结的可能。

三是地方官员“唯GDP”的政绩观。一些官员急功近利，热衷于打造、展现“亮点”与政绩。所以，城市规划随心所欲地被改来改去，建筑设施建了又拆拆了又建。

规划不能唯长官意志，就必须从制度建设的高度维护好规划的刚性约束力。城市规划的制定，需要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，尊重市民的意见，听取各领域专家的建议，对城市规划及调整实行公示、听证等制度，让作为城市主人的广大群众对规划拥有充分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规划一旦确定，谁如果随意变更，就让他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，特别是对那些唯长官意志越位决策的官员，必须予以严惩。

袁浩

警惕偏颇的「经营城市」思想杀回马枪